

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

程平山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大量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竹书纪年》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竹书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宋元时期若存若亡,明代出现完整的二卷本。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或“近本”。究其缘由,中外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涉及到《竹书纪年》的版本、源流、真伪、价值等问题,其中,《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成为争论的焦点。百年来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较之明清学者有较大的进步。所以,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分析成绩与不足,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百年来《竹书纪年》的研究阶段

百年来学者对《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是承明清学者而来。明清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显示出扑朔迷离的态势,多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汲冢出土原书的整理本,或褒或贬。少数学者或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古本《竹书纪年》亡佚之后的伪作;或斥《竹书纪年》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或以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为后世的辑补本,可以分析使用;或以为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

百年来学者对《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年至20世纪70年代,王国维的观点流行。1911年,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汲冢原书的整理本。1912年,王国维在日本借阅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清人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深受启发。1917年,王国维将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重新整理,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均载《王国维遗书》第12册),指证今本《竹书纪年》之伪。二书出版后,随着王国维学术声望的鹊起,中外学者广泛接受他的观点。

此阶段,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主要有5种观点。①古本《竹书纪年》真,对其价值肯定、怀疑、否定者皆有;今本《竹书纪年》伪,有少量的参考价值或无价值。持该观点的学者有王国维、梁启超、内藤湖南、新城新藏、钱穆、顾立雅(Herrie G. Creel)、张心澍、陈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顾颉刚、杨宽、鲁实先、董作宾、普实克(Průšek Jaroslav)、范祥雍、许里和(Erich Zürcher)、白寿彝、何炳棣、劳榦、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等。②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陈曾则、章鸿钊等。③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马伯乐(Henri Maspero)、阿列克

谢·德布尼克(Aleksy Debnicki)、徐中舒等。④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顾实、蒙文通、朱希祖(1939)、李宗侗、杨树达、赵荣琅等。⑤古本、今本《竹书纪年》并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林传甲、崔适、朱希祖(1919)、钱基博、吕思勉、山田统等。

第二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同观点的对峙。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王国维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足,于是纷纷质疑,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许多认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于是形成各种观点的对峙局面。

此阶段主要有 6 种观点。①古本《竹书纪年》真,有重大价值;今本《竹书纪年》乃古本亡佚之后的伪作,仍有一定价值。学者只是利用王国维旧说,缺乏新时代新资料下的系统论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范祥雍、白寿彝、杨宽、劳榦、何炳棣等(以上坚持原有观点)、李学勤、平势隆郎、巴纳德、藤田胜久、邵东方、张培瑜等。②以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吴晋生等。③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恢复原状即可。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朱永棠等。④古本《竹书纪年》真,有重大价值;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方诗铭、陈力、曹书杰、张富祥等。⑤古本《竹书纪年》属于辑佚本、今本《竹书纪年》属于重编本,强调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倪德卫(David S. Nivision)、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等。此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⑥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杨朝明等。

二、关于《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的观点

百年间,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的存在不同观点,各种观点随着时代与资料丰富,又有不断的修正与补充。

1. 以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陈曾则《京师优级师范 国文讲义》(商务印书馆,1916 年)仍以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所出,为千古之大文。章鸿钊《中国古历疑析》(科学出版社,1958 年)以为今本《竹书纪年》为魏史之旧,非后世搜集而成者。他不同意清人崔述、王国维说,以为二人苛论偏见所在皆是。吴晋生《竹书纪年非伪书辨》(《文史哲》1996 年第 2 期)等以为今本《竹书纪年》为晋初束皙等整理本,不满于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序》所列十二条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的证据,遂一一批驳。

2. 今本《竹书纪年》原出于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马伯乐的《公元前四世纪齐王纪年》(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e Ts'ï au IV^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通报》Second Series, Vol. 25, No. 5, 1928)以为今本《竹书纪年》较之古本文字有明显的改变,今本《竹书纪年》经过重编与歪曲。阿列克谢·德布尼克《竹书纪年:古代中国社会史的一种史料》(The Chu-shu-chi-nien as a Source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Warszawa: Pan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56)以为除了少量的误置与不准确之外,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竹书纪年》之间没有其他不一致之处。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 年)以为,今本《竹书纪年》有错乱,亦有后人整理改动之处,但还是有所依据,不必完全排斥。朱永棠《核实的天文记载与正

确的尧舜禹及夏商周断代纪年》(《正确的四分月相概念和正确的夏商周断代公元纪年与黄帝到夏禹公元纪年》,黄山书社,2005年)以为今本《竹书纪年》经过后世编纂过,《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干支年份均为后世编辑加入,不必为此而抹杀这些今存书内的正确数据。

3.《竹书纪年》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科学书局,1914年)不相信汲冢能出竹书,以古本《竹书纪年》伪。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竹书纪年》乃曹魏遗臣伪作,黄帝以下年数不足据,纪列国之年无所不谬,据《史记》全面否定《竹书纪年》的年代。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北京大学讲义,1919年;独立出版社,1943年)以为古本《竹书纪年》盖晋束皙等所伪造,本不足信,今本《竹书纪年》又系宋以后人所伪造,更不足信。钱基博《古籍举要》(世界书局,1933年)以为古本《竹书纪年》乃西晋人伪作,而今本《竹书纪年》又非原本,遭后人篡改。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汲冢书”条均只承认汲冢出《竹书纪年》之事,不相信汲冢书流传下来,故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皆伪书。《竹书纪年》仅记战国事,其余为后人增窜。山田统《竹书纪年の后代性》(《国学院杂志》61-11,1960年)以为古本《竹书纪年》属于后出文献,否定其史料价值。

4.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乃古本《竹书纪年》亡佚之后的伪作,对其价值又有不同的观点。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自序》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佚于两宋之际,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搜辑,复杂采《史记》、《通鉴外纪》、《路史》诸书成之,非汲冢原书。《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认为今本抄袭他书,年代又多杜撰,错谬严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华书局,1936年),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新城新藏《周初之年代》(《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第二编,沈睿译,中华学艺社,1933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董作宾《殷历谱》(中研院石印本,1945年)、《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1年第3期),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London: Keh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8)、《中国治国术的起源》卷一《西周帝国》(*The Origins of the Statecraft in China, vol. 1,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张心澂《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4年),陈梦家《六国纪年》(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高本汉《殷代的兵器与工具》(*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7, 1945),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2年),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鲁实先《今本竹书纪年辨伪》(《复旦学报》1947年第3卷),普实克《竹书纪年的真实性》(*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u-Shu-Chi-Nien*,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 1970),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关于〈古本竹书纪年〉的亡佚年代》(《文史》25辑,中华书局,1985年),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Leiden: Brill, 2007),白寿彝《中国史学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吴珣《竹书纪年系年证伪》(《台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第9号,1965年),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1期,1973年)、《〈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四分溪论学集》,台北允晨文化,2006年)等,劳榦《周初年代问题与月相问

题的新看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第1期,1974年)、《殷周年代的问题——长期求证的结果及其处理的方法》(《史语所集刊》第67本第2分,1996年)等,吉德炜《商史资料》(*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竹书纪年及商周纪年》(*the Bamboo Annals and Shang-Chou Chronology*, *Harvard Journals of Asiatic Studies* 38, 1978),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平势隆郎撰《今本竹书纪年之性格》(《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0, 1992年),巴纳德《古代中国纪录中的天文学资料: 历史研究方法之必备》(*Astronomical Data From Ancient Chinese Record: The Requirement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East Asia History*, 1993),藤田胜久《〈史记〉三家注所见〈竹书纪年〉佚文》(载《〈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邵东方《〈今本竹书纪年〉诸问题考论》(《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从思想倾向和著述体例谈〈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2期),张培瑜《〈大衍历议〉与今本〈竹书纪年〉》(《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接受了王国维的观点。

关于古本《竹书纪年》的价值。①怀疑与否定。王国维的早期研究对古本《竹书纪年》很重视,后期研究《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将汲冢《竹书纪年》视同《牒记》之流,不可信。内藤湖南以为古本《竹书纪年》是战国历算之学发展的结果。顾立雅对年代及黄帝、禹这样所谓传说中人物记载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他以为古本《竹书纪年》并非商代与早周的当代史料,而是撰写于战国时,许多混合材料搜集在一起。顾颉刚以为古本《竹书纪年》中西周以前的事,全部是传说,价值不太大;只有春秋、战国部分可靠。吉德炜以为《竹书纪年》的作者没有获得商与早周的可靠年代资料,古本《竹书纪年》东周部分可能是真实的。②赞同。高本汉、何炳棣认为古本《竹书纪年》是依靠周室、宋国宗庙的档案而编写的,有其古史的根据。李宗侗认为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史料历夏、商、周三代,几近二千年之久,价值当在《春秋》之上。李学勤认为古本《竹书纪年》对于研究夏代史仍然是一部极重要的书,在世系、事迹、都邑、年代四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王国维、钱穆、许里和以为今本《竹书纪年》虽为伪书,仍有价值,可以谨慎利用。

5. 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大东书局,1928年),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蒙文通《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年),杨树达《书〈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后》(《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赵荣琅《竹书纪年今古本问题及其评价》(《大陆杂志》第8卷第10期,1954年),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005年修订本),方诗铭《关于王国维的〈竹书纪年〉两书》(《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二)》),陈力《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辑《研究生论文选刊》,1985年),曹书杰《中国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富祥《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文史哲》2007年第2期)等以为今本《竹书纪年》的性质为辑补,可以分析使用。朱希祖以为《纪年》原本有荀勖、和峤旧本(起自黄帝,西周末年以后仍用周纪年,故用周正)与束皙改定本(起自夏、商,西

周末年以后,改用晋、魏纪年,故用夏正)之别。今本《竹书纪年》,盖后人得荀、和旧本的宋三卷残本及《师春》所录,又杂采他书以补缀之。方诗铭以为北宋期间《纪年》的残本具在,重编者首先以此为据,再从古注、类书中搜辑佚文,重新加以编辑。陈力以为今本乃唐十四卷《纪年》之残本而经后人加以补辑而成,编定成书不晚于北宋初年。

6. 古本《竹书纪年》属于辑佚本、今本《竹书纪年》属于晋初的重编本,强调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倪德卫、夏含夷不仅继承了理雅各(James Legge)在译注《中国经书》(*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三卷《书经》(*The Shoo King*)附录《竹书纪年》(南天书局,1991年)中的观点,并且吸收了朱希祖、方诗铭、陈力等人的观点,形成了新的学说。倪德卫《三代年代学之关键:今本〈竹书纪年〉》(《经学研究论丛》第10辑,学生书局,2002年)、《〈竹书纪年〉解谜》(*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华艺出版社,2009年)等以为《竹书纪年》分原本、今本和古本。原本是指公元前299年魏王死时和他一同入藏的《竹书纪年》。今本乃晋武帝时出土的《竹书纪年》原本的一个副本,或出于整理汲冢竹简晋廷学者之手的未定本,其内容大部分真实但又不完整。古本是指从早期注文、类书及其他数据中辑录的佚文辑本(如王国维的辑本)。班大为《〈竹书纪年〉再研究:基于编年史研究西周早期年代学之方法的问题》(《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认定今本《竹书纪年》基本可靠,只是被改变过(于公元前296年埋葬之前和在公元281年发现以后的编纂整理中都被歪曲过),恢复原状可以得出正确结论。夏含夷《〈竹书纪年〉与武王克商的年代》(《文史》第38辑,中华书局,1994年)以为今本《竹书纪年》虽然从出土到成书的过程中经过了晋代学者不少的编排改动,其中有些出于伪作,但是此书基本上还是与战国中叶墓本出土时的真本相去不远,更绝非宋代以后之伪作。夏含夷《〈竹书纪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论汲冢竹书的不同整理本》(载《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为《竹书纪年》至少存在荀勖与和嶠、卫恒与束皙先后两个整理本。酈道元《水经注》引用的《竹书纪年》是荀勖、和嶠整理本,与今本《竹书纪年》基本上相合;徐广、王劭、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的《纪年》是束皙修正本。

7. 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杨朝明《沈约与〈今本竹书纪年〉》(《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为今本《竹书纪年》的整理改定者是南朝沈约。沈约整理并附注今本《竹书纪年》,而今本《竹书纪年》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是由于沈约重新写定时间匆促所致。

三、简要的评论

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改变了王国维对于《竹书纪年》的认识,而王国维的后继之作又改变了学术界对《竹书纪年》的认识状况。王国维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是继往开来的,他的观点得到中外学者广泛的赞同,整整影响学术界百年,这是明清时期不曾有过的事情。明清时期流行的今本《竹书纪年》为汲冢原书的观点走向衰微,绝大多数学者认识和承认今本《竹书纪年》的不足与错误,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伪的观点成为流行观点。但是,王国维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既非全面,又非系统,尚有许多地方需要补充修订。

一些学者以为今本《竹书纪年》原出于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一些学者则以

为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尽管意识到今本《竹书纪年》存在严重的问题,却采取过于宽容的态度,只对行为描述,而缺乏对性质的准确判定,从而影响他们论说的可信性与准确性。

一些学者以为古本《竹书纪年》属于辑佚本、今本《竹书纪年》属于重编本,强调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一些学者以为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这两种观点在唐宋元时期的文献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而是学者的间接推测,可靠程度小。

百年间学者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囿于资料与视野,对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对于数据及史实辨识不足;学者研究《竹书纪年》多集中在《竹书纪年》本身以及将《竹书纪年》条文分离地和其他文献比较,而缺乏在翔实数据下的系统研究。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竹书纪年》仍会有新的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秦汉边郡研究

杜晓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在秦汉地方行政结构中,内郡与边郡在行政职能、吏员设置、民族构成、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诸多差别。研究秦汉边郡,对于探索秦汉时期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秦汉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秦汉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边郡研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从秦汉中央政府分层次、差别化治理、边郡防御系统、边郡职官设置、屯戍、文书运行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秦汉边郡的情况。笔者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论著,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秦汉边郡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一、关于边郡的综合性研究

关于边郡的综合性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边郡的综合性研究,国内学者大都从边疆史地的角度入手。木芹把西汉政区划分为五个层次,以三辅、河东郡、弘农郡、河内郡、河南郡为第一层次,将五原、云中、定襄、上谷、渔阳与北海、济南等 71 郡及广阳、中山、真定等 16 诸侯国作为第二层次;以武威、酒泉、敦煌、牂柯、益州、玄菟、南海等郡作为边郡,作为第三层次,或三类政区;以属国都尉为第四层次,或四类政区;以西域都护府为第五层次,或五类政区;以匈奴单于地为第六层次(《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版)。李大龙更进一